



西南边疆民族文库·边疆文化研究丛书
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百苗图研究》之一

百苗图疏证

刘锋 著



民族出版社

死藏王布一幅開腰間
謂之補翠男必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国林业出版社

百苗图疏证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国林业出版社



西南边疆民族文库·边疆文化研究丛书
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百苗图研究》之一

百苗图疏证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苗图疏证/刘锋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 1

ISBN 7 - 105 - 05973 - 7

I. 百... II. 刘... III. 百苗图—注释 IV. K28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32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310 千字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3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经济文化室电话: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总 序

宋蜀华

“百苗图”是源自清代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一系列抄本的总称。“百苗图”是珍贵的历史民族志，其珍贵之处有三：一、它是可以明确断代而又自成系统的贵州民族志典籍。二、它是图文并茂的历史民族志，信息荷载极其丰富。三、它是出自原作者陈浩的亲身调查，所载资料准确可靠。然而，由于“百苗图”附有彩绘插图，批量刻版流播极其困难，故一直是以临摹抄本传世。时至今日，国内外公私所藏抄本多达百余种，不仅各抄本之间相互抵牾，而且不管哪个抄本，都有大量错讹、脱衍，以至研究者无所适从。为使这套珍贵的历史民族志典籍原貌得以恢复，全面地发挥其资料价值，立足于现有抄本，进行抢救性研究、整理，实属刻不容缓。然而，由于历史民族志整理难度极大，长期以来，研究者往往望而生畏，以致这一研究工作被长期搁置下来。

1

杨庭硕教授组织了研究小组，不避艰难，历时六年，完成了“百苗图”的研究整理任务，从中总结出一



整套校释历史民族志的规范和体例，既填补了研究、整理“百苗图”的空缺，又对历史民族志的研究开拓了一条新思路，使历史民族志的研究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该小组倡导的多学科相结合的校释方法，对类似文献的研究、整理做出了有益的示范，对历史民族学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研究整理汉文历史民族志典籍，是一件极其艰苦细致的工作，它除了面对古籍整理中的各种困难外，还需要克服六重障碍，才能获得令当代满意，又能传诸后世的成果。

流传至今的汉文历史民族志典籍，成书于前人之手，又几经传抄改版，不同时代的经手人，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凭借自己的阅历和学养，对这些典籍进行不断的修改。前人的思想立场，显然与今世迥然不同，表现在历史民族志编写传抄中，总不免要把非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混入其中，对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在缺乏旁证资料的情况下，既难以识别，更难以剔除。今天的研究者若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万难分清混杂于一体的精华与糟粕，此其一。

历史民族志典籍中，各民族用语俯拾皆是，进入典籍的形式也千差万别，有的是音译，有的是意译，有的是音译兼意译，有的是通过中介语转译，不一而足。要弄清它们的翻译转写形式就更是难上加难，要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要求研究者具备汉语史的素养，还需要掌握各民族语言的历史流变轨迹。遗憾的是，时下语言学界



对各民族语言的历史流变掌握得不够充分，完成此项研究任务的学术基础极其薄弱。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逐一弄清历史民族志典籍中的各民族词语，考订其读音、含义、流通时限、使用范围及译写形式，确实是一项极其艰苦又难于见成效的研究任务。研究者若无深厚的语言学功底和相关各民族语言的素养，万难成事，此其二。

典籍整理必然要碰到地名沿革问题，这一繁难问题在历史民族志整理中，还会派生出新的障碍。这是因为历史民族志中涉及到的地名，不少是仅见于一例，最多也不过二三例，地名的传承沿革变易，旁证资料十分缺乏，难于弄清沿革变异的线索。单就贵州而言，被称作龙里者不下五处，被称为凯里者不下七处，被称作清水江的河流就有三处。这些地名所指代的地方往往相去数百里乃至千里。要想逐一弄清典籍中出现的地名到底指何地，即使是对沿革地理极为熟悉的地名沿革学家，也不免望而生畏。要做好这项工作，除了要遵循地名沿革考订的一般准则外，研究者还必须拿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逐一对比各地地名的古今差异、民族差异、文白差异及行政建制变迁，因而光靠查典籍万难成事。研究者若不具有深厚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功底和实践经验，就无法完成此项任务，此其三。

整理其他汉文典籍，当然也会碰到文化事项诠释，但那仅属于古今文化事项的流变诠释，其流变的线索极为分明，诠释难度并不大。整理历史民族志典籍则大不



一样，由于这类典籍提到的文化事项到底属于哪个民族，流行于什么时代和范围，往往缺乏足够的旁证资料，而且流变脉络纠缠不清，加之典籍的原作者和传抄者常常仅就偶然的一得之见敷衍成文，考订起来倍感佐证资料贫乏。比如，在“百苗图”原本中，光是“不落夫家”婚习就有五种表述方法，涉及到布依族、侗族、壮族、苗族、水族等五个民族，若不借助民族学的相关理论，终不免在不自觉中张冠李戴或人云亦云。要想跳出民族本位偏见的窠臼，研究者全面把握当代民族学的前沿理论，实属必不可少，此其四。

历史民族志的原作者和传抄者对汉文典籍太熟悉了，以至在编写和传抄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要用汉族文化事项去比附其他民族和杜撰相关民族的文化事项，以至流传至今的不少历史民族志典籍中，普遍存在着从汉文化角度看，逻辑严密，描写精当，但从相关民族的角度看却于理不通的实例。以“百苗图”为例，该书的“九股苗”条对苗族甲冑和“偏架”（一种巨型弩机）的描写和附图就大成问题。按照书中的描写，这样的甲冑穿上后根本不能活动自如，而且，如此巨型的弩机，也难以用于两军正面对垒，只能充作伏击用的武器和猎具。要对此类描写做出正确的校勘、整理和诠释，若无工艺制作和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必然会在研究整理中以盲导盲。因此研究者要获得工艺制作和科学技术的相关知识，不仅要熟悉当代科学技术现状，还需对科学技术史有较深的了解，此其五。



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间总是不断地互相影响，文化事项交错互动和渗透，致使同一文化思想可能在不同民族中以不同形式并行存在，而历史民族志的作者和传抄者的个人阅历有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凭借个人偶然所见成文，致使流传至今的历史民族志典籍，其涉及到的文化事项往往源流难辨。要研究整理好历史民族志典籍，就得对典籍涉及到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充分的了解，能从文化事项发展的角度，将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逻辑理出个系统来。为此，研究者和整理者不仅要熟悉典籍，还得熟悉当代的相关民族研究成果；既要作跨越古今的了解，又得找出沟通古今的途径和办法，这就难乎其难了。“百苗图”中有关苗族的葬习就多处提到，但不管哪一处，其所属的内容从表面上看，几乎风马牛不相及，若不从苗族固有的生死观出发，就万难将该书中提到的“树葬”、“崖葬”和“悬棺葬”、“停柩待葬”、“洗骨葬”、“二次葬”、“缚肢葬”整合起来，弄清它们全是从“风葬”流变而成的演化形式，并以此将它们与彝族的“火葬”、百越各族的“厝置葬”区分开来，进而弄清这些民族间如何相互影响，诱发为各民族具体的葬习演化。因此，必须从文化互动的角度去梳理历史民族志典籍中提到的文化事实，这是历史民族志研究的第六大难题。

杨庭硕教授主编的“百苗图研究丛书”，在上述六个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尽管前面的研究道路还很长，但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十分难



能可贵了。时当西部大开发次第推进之际，百废待兴，历史民族志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理当紧紧跟上，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西部大开发。现在贵州特别选择“百苗图”作为历史民族志整理的突破口，其热诚和已取得的成效，实属可喜可贺。此项研究的成功，不仅为民族学界、史学界提供了一部可靠的“百苗图”善本和准确的“百苗图”注本，还以此为契机系统地梳理了贵州历代民族志典籍，为贵州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因而，该丛书的出版是对历史民族学的一大贡献。相信该丛书所作的奠基性工作，必然会引出国内外类似丛书的出版，并使之蔚然成风，将历史民族学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谨此为序。

2001年3月3日



序

冯祖贻

本书为“百苗图研究丛书”的第二本，与已出版的《〈百苗图〉校释》为姊妹篇，两书一为“校释”，一为“疏证”，从文献整理的角度而言，恰好互为表里，相互补充。

成于清嘉庆年间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为陈浩所著，原本至今尚未发现，估计已在流传中佚去，但不同时代的各式传抄本、节录本却多达百余种，多数以《百苗图》名义流布。关于此书的价值，宋蜀华教授在“总序”中已指出，“是珍贵的历史民族志典籍”，并扼要地介绍了其可珍贵之处。以杨庭硕教授为首的一批民族学者，正是认识了它的价值所在，历时六年，终于完成了“校释”、“疏证”、“汇考”、“补正”、“文献通考”、“补正图志”、“原图汇编汇释”共七种著述，将陆续出版问世。至此，《百苗图》的整理、研究蔚为大观，它必将对贵州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民族文化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清代学者曾言：“著书难，注书更难。”因为注释一本



书,不仅要掌握原书的精神实质,而且要察知原作者为何要这样写,他的依据是什么,所谓“无一字无来处”,方能“条举件系,如数家珍,难矣!”(黄本冀:《三长物斋文略》卷一)在注释后的疏证,同样是件难事。一位清代学者曾讲了一段话,今引述如下:

“作者不易,笺书家尤难。何也?作者以才为主,而辅之以学。兴到笔随,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纵横曼衍以极其所在,不必沾沾獭祭也。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向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而佐证乃确。才不必言;夫必百千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杭世骏《道谷堂文集》卷八)

2 所以“校释”(“释”实际是“注”)历来都需积学多年、极富才思的饱学之士才能担当。我很钦佩杨庭硕教授和他指导下的,包括湖南、贵州两省的多位学者的理论与学术功力,李汉林先生主持的“校释”,从体例设置之精当到释文所征引文献之广博实可赞叹;这一本由刘铎先生主持的“疏证”则在“校释”基础上,又将《百苗图》成书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且是最大限度地揭示了《百苗图》原作者的编写意图和所属内容的基本结构,它确实起到了让当代读者认识和了解《百苗图》的导读作用。不止如此,细言之,我认为《〈百苗图〉疏证》(以下简称《疏证》)还有以下几个可贵之处值得读者注意。

第一,《百苗图》原作者是清代汉族地方官员,由他记述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必然带有种种偏见(其实不止



《百苗图》存在这个问题，其他汉文文献也带有相同问题)；就时代而言，也必然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这种跨文化记载的历时性资料，如何为今天的读者理解、接受？研究者又如何拨开迷雾、去伪存真，让它与当代的认知相衔接？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本《疏证》与一般的古籍疏证最大的不同之点，就在于《疏证》作者用当代的民族学理论与民族学研究办法，纠正了原作者的文化偏见，整合了原作者的记述和相关文献，并将原著所涉及的文化事项一一考订了它的民族归属，它在当时的功能及历史演化的轨迹。这样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再是一堆布满历史尘埃的无序的文字堆积，而是与读者、研究者息息相关的、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演进的历史图卷。

3

第二，《百苗图》所涉及的对象，包括今天的苗族各支系、布依族各支系、侗族各支系及水族、壮族、毛南族、仡佬族、彝族、瑶族、土家族、白族等民族，还有一些历史上汉族移民的后裔。对上述各民族文化表征上的差异，乃至各支系之间的差异，今日民族工作者和研究者是比较清楚的；然而在历史记载上，混淆不清、指鹿为马、以讹传讹的现象却屡见不鲜，《百苗图》自不例外，这给我们今天利用它造成了不小的困难。这里可以举一些民族史研究上常见的例子：往往一则史料，多个民族都在使用；一项文化事项，存在多种不同诠释。这里并不排斥史料或文化事项本身存在界限模糊或涵盖面广的问题；但也应当看到，由于原记述者认知的



局限而产生的种种谬误，关键在于今日研究者如何进行辨别。一个最简单的然而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对史料和文化事项逐一考订，涉及文化功能的还要逐一梳理，这自然要求我们必须运用历史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各民族的历史及历史上的各民族间的关系。《疏证》的作者就是采用这种办法，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细心的读者只要翻检本书，那些令人豁然开朗的见解几乎俯拾皆是。还有，一些文化事项对民族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以致它一直保存至今，这就需要与当今田野调查结果相对接，将历时性资料与共时性田野调查资料进行对比，方能看出该民族（或该支系）文化深层结构演进的时差。这自然要求对当今民族文化要有全面及深入的把握。初读书稿后，给我印象最深之处有三：一是《疏证》作者将《百苗图》所载资料作为一个坐标点，又将相关文献（包括各代《通志》、各类私家记述、各种文献等）围绕这个坐标点进行了纵横比勘，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得出了比较合理的文字判断。二是将这个判断与解放后进行的大量民族调查、田野调查（不少是作者亲自参加过的）相结合，才形成了令人信服的依据，而这些论据又广泛吸取了当前民族史、民族学、方志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博采众长。三是作者研究领域丰富，视野开阔。一部《疏证》，跨时空地将古与今打成了一片，将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融为了一体，体现了《疏证》作者建立在各学科理论、方法之上的综合研究功力和水



平。与原作者相比,《疏证》作者的确做到了清人要求的“百千倍于作者之卷轴”。

第三,为了更好地体现将文献与实证融为一体的特色,《疏证》作者在本书的体例上有所创新。《疏证》没有局限于传统疏证所负疏导文字、指正核事的功能,将每个条目下的疏证本文,根据本书总体要求,分为三个栏目:说解、提示和备考,三个栏目都赋予了全新的责能。“说解”并不满足于就文敷义,而是将该群体基本文化归属问题及当代情况进行剖析,读者从“说解”中,不只是正确地理解了《百苗图》原文、原图,更能从文化上比较准确地把握该群体分布情况、总体特征及古今演变等。“提示”是疏证中的主体部分,它横向比较了本条目与其他条目的关系,考订了该条目所涉及民族的文化内涵及特点,揭示相关文化特点演化脉络,澄清了历代相关记载的错误。读者通过“提示”,可以获得非常丰富的文化上的知识和作者在许多方面的精辟见解。“备考”则针对《百苗图》原图原文,提出了若干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疏证》的作者并没有强作解人,而是在与读者共同商榷,以求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态度是谦虚和审慎的。因此,本书在吸取了“疏证”这一传统体例的同时,从形式到内容都作了深化和创新。它的出版,对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特别是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将是有益的示范和参照。

《〈百苗图〉疏证》一书的优点和特点尚有许多,就不再一一例举了。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本人曾参加了该课



题的结题验收工作,并关心这套书的早日问世。承杨庭硕先生、刘锋先生不弃,谆嘱写一小序,是以不揣浅陋,写一点感想于上,尚祈高明不吝指正。

2001年10月



编排凡例

一、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是图文相辅的历史民族志专著，全书共有八十二个条目及八十二幅图。我们收集到的各抄本中，绝大多数无序、无跋，且无目录，仅有条目编排序号。经反复研究后，才注意到陈浩是通过条目的先后次序编排去隐含地揭示各条目间的亲疏远近关系，即条目编排顺序乃是该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隐藏了大量的民族文化资料信息。李汉林《百苗图校释》一书附录中对此已有探讨，可供读者参考。作为该书的疏证，本不该打乱原书的编排顺序，但考虑到该书成书距今已两百年，两百年间对贵州各民族的认识与陈浩时代的认识相距不啻天壤，要今天的读者猜透陈浩编排次序中隐含的社会文化现实，其难度不下于解读密码。为便于读者阅读、理解、查对古人和今人对贵州各民族认识的差异，只好以当代习见的民族分野和民族谱系为纲，重新编排陈浩原有的八十二个条目顺序。

二、本书将贵州的十二个世居民族分五篇编排。苗瑶篇包括苗瑶族系中的苗族与瑶族；百越篇包括百越族系的布依族、侗族、水族、毛南族、壮族、仡佬族；氐羌篇包括氐羌族系的彝族、土家族和白族；汉族篇收载不同时代移居贵州的各汉移民群体；存疑篇收载贵州历史上特殊原因形成的民族群体的有关条目。原则上每个民族的有关条目编为一章，例外情况是汉移民篇、存疑篇不分章。

三、陈浩原书收载的八十二个条目，其指称范围广窄不一，有时一个条目即介绍一个单一民族，有的条目则是介绍某民族的一个支系或亚支系，甚至是介绍某一特定地域内的小群体乃至职业群体或婚姻群体。为便于今天的读者查找，本书于各章节之内